

北宋嘉祐石经复原初探*

徐炜君

内容摘要:北宋庆历至嘉祐年间,朝廷于国子监刊立石经,然不为当世所重,后又因战乱、水患等原因,石经逐渐沦亡,罕有残石、拓本传世。清代以后,残碑时有出土,学者为之著录、题跋,略述其碑式、行款、文字。今据已知残碑拓片及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所藏剪裱本,考证其形制与布局方式,并尝试复原部分经碑。再结合熹平石经“骈罗相接”的布局方式、开成石经的“跨书”现象以及广政石经所体现的“帖式刻石”,揭示北宋石经对于汉、唐、蜀三朝石经在布局、形制上之继承。

关键词:北宋石经 碑图 碑制

一、引言

关于嘉祐石经的形制,宋元时期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。清代曾出土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四经残碑,黄叔瓚谓《周易》《尚书》经碑“石长五尺四寸,宽二尺六寸,凡六排,各三十六行,篆隶相间,表里镂字”^①,《周礼》则“每面六排,各三十行,上下不相属。正书篆字,释文楷书。石长与祥符石经等,宽减三寸”^②,翁方纲称《檀弓》一石“凡六层,层几行不可计,每行篆楷皆十字”^③。清末民初,开封曾出土《孝经》残石,罗振玉谓存四十一行^④,安金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”(13&ZD063)阶段性成果。

①黄叔瓚:《中州金石考》卷一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12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42页下。

②黄叔瓚:《中州金石考》卷一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12册,第544页下。按,“祥符石经”指《周易》《尚书》经碑。

③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十六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,第503页下。

④罗振玉:《北宋嘉祐石经〈周礼〉〈礼记〉残本跋》,《雪堂校刊群书叙录》卷下,《罗振玉学术论著集》第九集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347页。

槐云“石面现残存文字二列,上列篆楷二十一行,下列残存篆楷二十行”,内容为《纪孝行》章尾部分、《五刑》章(全)、《广要道》章(后缺)、《广至德》章(全)以及《广扬名》章前一部分^①,与罗氏所述篇幅相同^②。1954年开封出土《礼记》残石,残长0.92米,残宽0.21米,厚0.22米,表里刻字,为《王制》《表记》二篇。《王制》可辨识者二列,上列存十行,行十字;下列损毁严重,仅存一二字。《表记》存三列,上列仅数篆字可辨;下二列均存八行,行十字^③。1954年至1956年间,开封又陆续出土《周易》二石、《尚书》一石。《周易》二石皆断为两截,一面刻字,另一面有凿痕而未见文字。其中一石残长1.91米,残宽0.36至0.42米,厚0.22米,石面存字六列,每列多则十六行,少则七行,行十字,内容属于《系辞》;另一石残长1.67米,残宽0.43米,厚0.22米,石面存字六列,每列多则十六行,少则十五行,行十字,内容属于《节》《中孚》《小过》《既济》《未济》。《尚书》一石残长1.5米,残宽0.86米,厚0.22米,此石一面为后世增刻之龙形纹饰,文字俱灭,另一面埋于地中,为石灰剥蚀,文字损毁严重,残存文字可辨识者仅五列,每列三十四行,行十字,内容属于《康诰》《酒诰》二篇^④。1982年开封出土《周礼》经碑一,残长1.76米,残宽0.85米,厚0.20米,表里刻字,每面均六列,每列三十行,行十字。碑版正面为《天官·冢宰》,背面为《春官·宗伯》^⑤。总之,清人及现代考古学家皆仅据出土所见残石描绘其形制,且有不甚精确者^⑥。20世纪,学界对于嘉

①安金槐:《记开封新收集的北宋石经》,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8年,第1163页。

②《孝经》残石之出土时间,安金槐文系于1922年(安金槐:《记开封新收集的北宋石经》,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第1158页),据罗振玉跋则当在1917年之前(上揭雪堂跋文署“丁巳闰月”,则其得《孝经》拓本当在此之前。罗振玉:《北宋嘉祐石经〈周礼〉〈礼记〉残本跋》,《雪堂校刊群书叙录》卷下,《罗振玉学术论著集》第九集,第347页),未知孰是。

③安金槐:《记开封新收集的北宋石经》,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第1159页。

④安金槐:《记开封新收集的北宋石经》,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第1159页。按,安氏谓存残字六列有误,说详下文。

⑤张子英:《河南开封陈留发现北宋二体石经一件》,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第1166页。

⑥如安金槐称《尚书》残碑每列三十四行。然据笔者复原,并非如此,详见下文。

祐石经之关注本就不多^①,而经碑形制问题的研究更为缺失。进入 21 世纪,顾永新对嘉祐石经经数、刊立时间、散佚、修复、补刻、书经人等历代众说纷纭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索,勾勒出石经从刊立到沦毁的大致过程;并考证出石经经目为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八种,清代以来所见《孟子》系元代补刻^②,皆突破前人之成说,可谓定谳,惜未涉及石经形制等问题。除此之外,仅晁会元曾试图复原碑图^③,然晁氏对于石经每层行数的认识有偏差^④,结论亦当与事实有所出入。

笔者据所见拓本及已知诸残石内容,认为二体石经各经经碑形制各异,甚至一经中各碑每列行数亦有较大出入。本文的方法系结合已知曾出土及仍存世的残石与拓本,在已知行款、刊刻格式等信息的基础上,并依据拓本中所见拼接痕迹,在一定的范围内,对残碑前后面的内容做出推断,以期为更全面地了解嘉祐石经的形制和碑图的复原打下基础。

残石形制尺寸及经文内容等信息上文已有陈述,皆藏于河南开封市博物馆等单位^⑤。嘉祐石经之拓本,主要有三。其一为丁晏旧藏,原拓半开八行,行十字,《春秋》行九字,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,墨拓本共四大册,其中《周易》存《升》《困》《井》《革》《鼎》《归妹》《巽》《未济》诸卦文及《系辞上》部分文字,《尚书》存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泰誓》《牧誓》《武成》《太甲》《洪范》文及《沃丁》《咸

①除安金槐、张子英二文之外,仅陈汉章《宋嘉祐石经异说考》(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第 1147-1154 页)、罗振玉数篇拓本跋文(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第 1155-1157 页)、徐森玉《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》(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第 1113-1119 页)以及马衡《中国金石学概要下》第四章《历代石刻》(马衡:《凡将斋金石存稿》,中华书局,1977 年,第 80-81 页)中有相关论述。

②顾永新:《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 年,第 687-702 页。

③晁会元:《北宋太学二体石经新证》,虞万里主编:《七朝石经研究新论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9 年,第 401-411 页。

④黄叔璥称“排”,翁方纲称“层”,安金槐、张子英、晁会元皆称“列”。按,柯昌泗云:“《干禄字书》虽用碑式,然分层横列,与开成石经同。”(叶昌炽撰,柯昌泗评:《语石 语石异同评》卷九,中华书局,1994 年,第 520 页)王昶《金石萃编》亦用“层”作为描述碑刻中由上至下划分的单位术语。且由于“列”在现代汉语中有“纵列”的含义,与石经横向划分的实际情况不一致,容易引起误解,故本文从柯昌泗说,以“层”为单位术语进行叙述。凡引述前贤观点时,则一遵原文。

⑤据《河南省志·文物志》载,今存残石七块,《周易》第二石藏河南省博物馆,《周礼》残石藏开封县图书馆,其余五石均藏于开封市博物馆(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:《河南省志·文物志》,河南人民出版社,1993 年,第 504 页)。

义》《伊陟》《原命》四篇小序,《毛诗》存《斯干》《无羊》《谷风》《蓼莪》《北山》《无将大车》《小明》《有頍者弁》《时迈》《执竞》文,《礼记》存《曲礼》《檀弓》《王制》《月令》《曾子问》《内则》《玉藻》《乐记》《杂记》《经解》《坊记》《中庸》《表記》《间传》《三年问》《乡饮酒义》诸篇文,《周礼》存《天官·序官》《内宰》《小宰》《女祝》《女史》《夏采》《地官·序官》《春官·大宗伯》《小宗伯》《司乐》《司几筵》《守桃》《巾车》《典路》《司右》《司隶》各职文,《春秋》存昭公十三年、十四年、十七年、十九年、二十年、二十二年、二十三年经文,《孟子》存《梁惠王章句》《滕文公章句下》《尽心章句上》文。经顾永新考证,《孟子》系元代补刻,故本文不予讨论。其二为罗振玉所得者,有《周礼·天官·序官》及《春官·大宗伯》至《大司乐》,《礼记·檀弓》《中庸》,《孝经·纪孝行》等五章,影印入《吉石庵丛书》第三集^①;又得善拓《檀弓》,复影印入第四集^②。其三为刘体乾旧藏,原拓半开六行,行十字,《春秋》行九字,今藏于上海图书馆,墨拓四册,其中《周易》存《升》《困》《井》《革》《鼎》《丰》《旅》《巽》《兑》《涣》《节》《中孚》《小过》《既济》《未济》诸卦文,《尚书》存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泰誓》《牧誓》《洪范》《旅獒》《金縢》《大诰》文及《分器》《巢命》二序,《毛诗》存《卫风·木瓜》《王风·黍离》《君子于役》《君子阳阳》《扬之水》《中谷有蓷》《兔爰》《葛藟》《采芣》《郑风·叔于田》《大叔于田》《清人序》《小雅·六月》《我行其野》《斯干》《无羊》《四月》《北山》《无将大车》《小明》《頍弁》《车鞳》《大雅·云汉》、《周颂·清庙》《维天之命》《维清》《烈文》《天作》《昊天有成命》《我将》《时迈》《执竞》《思文》《臣工》《噫嘻》文,《礼记》存《檀弓》,《春秋》存自昭公十三年至二十二年经文^③。中国国家图书馆另藏有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等、《礼记·檀弓》《孝经》大张拓片^④。

二、北宋石经形制考

据黄叔璥、翁方纲文所载和考古学者所述,以及拓本所示,可知北宋石经当为表里刻字,经碑一面从上至下分为六层,每层若干行,除《春秋经》每行九字之外,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孝经》皆每行十字。而

^①罗振玉辑:《吉石庵丛书》第三集,朝华出版社,2020年,第19-80页。

^②罗振玉辑:《吉石庵丛书》第四集,第5-24页。

^③丁、刘二氏拓本内容,见丁晏:《北宋汴学二体石经记》,贾贵荣辑:《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》第8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5年,第502-507页;刘体乾:《嘉祐石经残本跋》,转引自张国淦:《北宋石经考》,贾贵荣辑:《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》第4册,第484-486页。

^④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: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第38册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176-178页。

每层之行数,则诸经各有不同。诸经之书刻格式,亦各有特点。今所见之拓本皆为剪裱本,已不得遽见原碑之形制。而拓本中可见拼接痕迹,则可以为一层经文起讫之依据,并由此推算每层行数。

(一)书刻格式与每层行数

1.《周易》

据上海图书馆藏拓本《周易》第卅一叶(见图1)^①,可知卦符横跨两行,占一字;上下卦之标识亦作二体,为小字,先下卦后上卦,各占一行一字;每卷末有“周易卷弟某”真、篆二行,卷首则书“周易上(下)经某传卷弟某”真、篆二行。观国家图书馆藏《周礼》整张拓片,可见北宋石经于上卷尾题及下卷卷首之间,空二行以示分隔。诸经当皆如此^②。

推算石经每层行数与复原经碑密切相关。有整张拓片或者大块出土残石者,因有上下层经文可以参照,校以今本,便可推算出每层行数。据安金槐文,20世纪50年代出土《周易》残石有二,第一石残字自第一层第二行篆字“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”至第二层第一行篆字“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”,以唐石经本校之,当为三十五行,由此可以推测,经碑此面一层为三十五行,奇数层之末行当为篆字,其对应之楷体则位于偶数层之首行,呈真、篆参差状。第二石残字自第一层第九行篆字“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”至第二层第八行楷体“也”字,以唐石经本校之,当为三十四行,可知残石此面一层为三十四行^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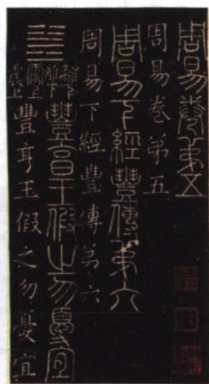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

上述三种主要的拓本皆为剪裱本,并无上下坐标可以参照,若能确定各层之起讫,则可推算出每层行数,进而复原经碑。今以上海图书馆藏拓本《周易》第六十四至第七十叶的内容为例进行计算、复原,并说明方法。第六十四叶(见图2)第四、五二行间有拼接痕迹,且第五、六二行之经文上承第四行,下连第六十五叶首行;第七十叶(见图3)第二、三行间有拼接痕迹,且第一、二行之经文下接第三行,上承第六十九叶之末行。将第六十四叶第五行至第七十叶第二行连缀,共可得三十四行经文(见图4),内容正与安金槐文

^①上海图书馆藏拓本每叶均有朱笔标识序号。

^②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: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第38册,第177页。

《周易》拓本第卅一叶为卷五之末与卷六之首,尾题和卷首之间未空行,然有拼接痕迹可以辨识,盖剪裱时将空行裁去。

^③安金槐:《记开封新收集的北宋石经》,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第1160-1161页。

所称出土第二石之首层相合,且行数亦与上文推算相符。由此可以证明,拓本中之拼接痕迹为判断碑面各层起讫的重要依据。复原经碑需以层为单位,按上述方法排列出行六层行数相同的经文,参照出土实物或者明确的文献记载,方能复原一个碑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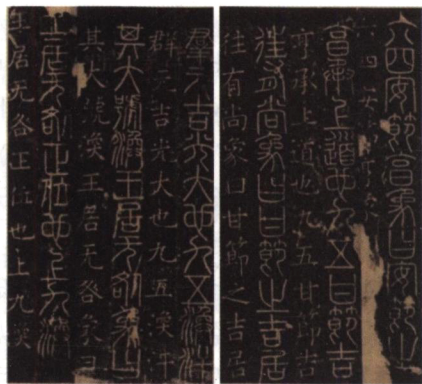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

图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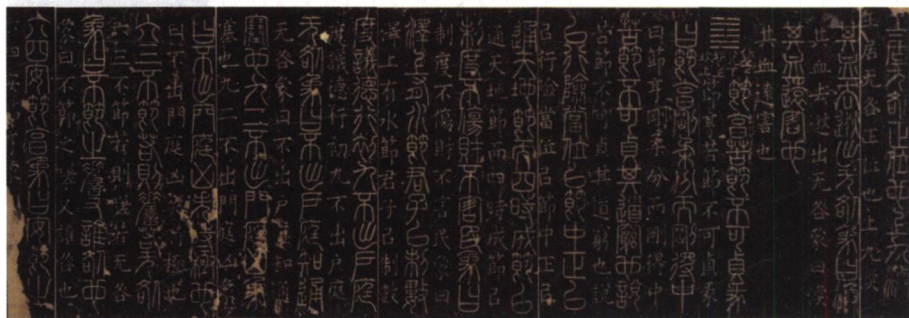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

由于经碑磨泐损毁或拓片残缺,剪裱本中难免存在整段经文中脱去一行或数行甚至更多的情形。如第七十九叶第五行为小篆“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”,第六行当为对应之楷书而磨泐严重;第八十叶首行当为小篆“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”,现仅存“与”字,第二至第五行文字已不可辨识,第五、六二行间有拼接痕迹,第六行为小篆“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”,与首行之间实脱九行。上述脱文情况可据嘉祐石经刻真、篆二体的体例以及唐石经本予以补足后,再进行排比复原。按照上述方法排比,从《周易》拓本第六十四叶第五行至第九十六叶第六行,可得六层经文,每层三十四行,内容为《涣》上九至《未济》九四,正与出土第二石相合。下图 5 为据上图藏本所复原的碑图,图中以仿宋字表示石经篆字,以宋体字表示石经楷书,红色部分为拓本残缺之处,今依唐石经本补出。

据第卅叶第二行至第六十四叶第四行,可复原《归妹》上六至《涣》九五

篇冠以《书序》，序后再书篇名，而后径书经文，俱不另行刊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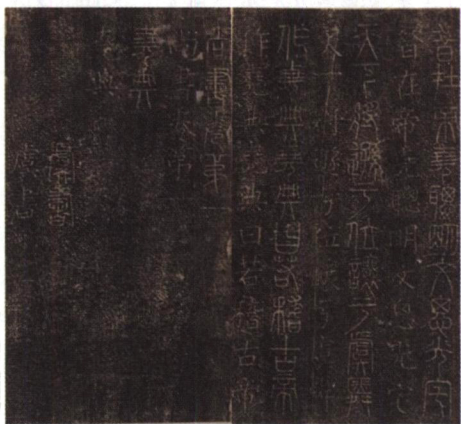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

图7

据安金槐文中所附照片，知出土残碑仅存五层文字。残碑第一、第二层中间部分文字尚较为清晰，碑两侧仅数字可以辨识。自第一层篆字“乌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”至第二层篆字“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”，以唐石经本校之，当为三十五行，由此可以推测，经碑此面一层为三十五行，奇数层之末行当为篆字，其对应之楷体则位于偶数层之首行，呈真、篆参差状^①。

依照前文所述方法，据上海图书馆藏拓本《尚书》第一叶至第卅叶首行，可以复原《尧典》全篇及部分《舜典》共六层经文，每层三十行，当系《尚书》第一碑正面；又据第五十一叶第二行至第八十四叶首行，可复原部分《洪范》至《金縢》序共六层经文，每层三十三行；又据第八十四叶第二行至第一百十三叶第六行，可复原《金縢》与《大诰》二篇部分文字，亦得六层，每层三十五行。

由此可知，嘉祐石经《尚书》碑每面之行数并不固定，黄叔瓚云“三十六行”者不确，安金槐称出土残碑“每列三十四行”亦非是。

3.《周礼》

据罗振玉《吉石庵丛书》三集所影印之拓本，可知每卷卷首顶格书“周礼卷第某”，奇数卷另行顶格书“某官某职第某”（见图8），《周礼》十二卷，其卷五、卷六当为《春官》经文，卷六卷次以下仅作“春官宗伯”（见图9），殆全经偶数卷皆如此例，与奇数卷不同。《序官》部分，每一官毕则另行书下一官职之属员（见图10）。经文部分，每一官毕则另行书下一官（见图11）。

据张子英研究，出土《周礼》经石每列为三十行^②。国家图书馆藏《周

^①安金槐：《记开封新收集的北宋石经》，虞万里编著：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，第1162页。

^②张子英：《河南开封陈留发现北宋二体石经一件》，虞万里编著：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，第1167页。



图 8



图 9



图 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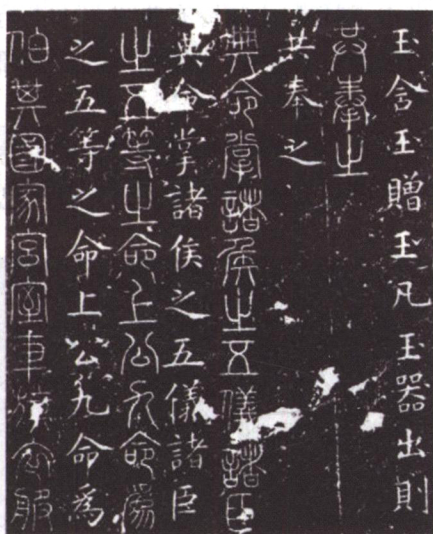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1

礼》整张拓片,为此石之背面,亦每层三十行^①。经碑二面上下层文字皆不相连属,以唐石经本校之,正面各层之间脱文八十七行,背面各层之间脱文八十六行。国家图书馆所藏丁晏旧拓有六段文字。第一段自《春官·大宗伯》“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”至“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”,计二十八行;第二段自“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”至“庶人执鹜工商执鸡以玉”,计三十行;第三段

^①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: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第38册,第177页。

自“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”至“号治其大礼诏相王之大”，计二十八行。此三段经文相连，共八十六行，其后正接国家图书馆所藏整张《周礼》拓片之第一层。第四段自《春官·司几筵》“右彤几昨席莞筵纷纯加”至《天府》“上春衅宝镇及宝器凡吉”，计二十八行；第五段自“凶之事祖庙之中沃盥执”至《典瑞》“缫皆二采一就以覲聘四”，计三十行；第六段自“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”至“祀大旅凡宾客之事共其”，计二十八行。此三段经文相连，共八十六行，其后正接国家图书馆所藏整张《周礼》拓片之第四层^①。此两大段经文行数相同。由此可以推测，嘉祐石经《周礼》书刻行款与《周易》《尚书》不同，系四碑衔接，由第一碑首层书至第四碑首层后，转接书于第一碑至第四碑之次层，依次而行。张子英根据脱文字数，推算“可能三块石碑拼接相当于一页”^②，是不准确的。

又出土经碑正面据黄叔瓚、张子英记载，存经文六层，每层三十行。《吉石庵丛书》三集中有此面之拓本，稍有残缺。依照前文所述方法，观其中拼接痕迹，发现第二、第四、第六层首行皆楷书，若以每层三十行排比，比勘唐石经本，则每层之间皆有脱文八十七行，与背面每层之间脱八十六行相近，亦可以证明上述关于《周礼》经碑之形制。

4.《礼记》

所有《礼记》拓片、拓本中皆未见卷首、卷末部分，无法确知其书刻格式，然当与他经大致相同。《礼记》无序，已知残字亦无分段，是其书刻格式较为简单。

翁方纲记载清代出土《檀弓》残碑，谓每层行数不可计；1954年出土之《王制》《表記》残碑，由于泐损严重，安金槐亦未计算其行数。观安文中《表記》残碑照片，存残字三层，第一层可以辨识者仅底部数字；第二、三层可辨识者八行，自第二层首行篆文“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”至第三层首行楷书“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”^③，以唐石经本校之，当为三十五行。国家图书馆藏有《檀弓》整张拓片，然仅上二层尚有文字可以辨识，自第一层“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”至第二层“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”^④。以唐石经本校之，当

①第四层第一行为“其玉器而奉之大丧共饭”，“其”字与上述第六段末行之“其”字重复，当为衍文。

②张子英：《河南开封陈留发现北宋二体石经一件》，虞万里编著：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，第1168页。

③安金槐：《记开封新收集的北宋石经》，虞万里编著：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，第1160页。

④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：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第38册，第178页。

为三十六行,则此残碑每层三十六行。

据《吉石庵丛书》四集中所影《檀弓》残字,依照前文所述方法,可复原六层经文,每层三十六行,实即国家图书馆所藏整张《檀弓》拓片。据《中庸》残字可复原三层经文,每层三十四行。又据上海图书馆藏《礼记》拓本《檀弓》残字,可复原一面六层每层三十四行经文,另得一面每层三十五行经文。

由此可知,嘉祐石经《礼记》碑每面之行数并不固定。

5.《毛诗》《春秋》《孝经》

北宋嘉祐石经之《毛诗》《春秋》二部,俱未有残碑著录或出土;《孝经》碑仅存二层残字。兹据所见拓片、拓本,略述其格式与行款。

据上海图书馆藏《毛诗》拓本第四、五、七、五十七叶,可知《毛诗》每卷卷首顶格书“毛诗卷第某”,另行顶格书篇题,不题“诂训传”,与唐石经本不同,复另行低二字书该篇所属之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(见图12)。后另行顶格书《诗序》,又不空格接书经文(见图13),一诗毕则著篇名、章句数。每卷末合计本卷之篇、章、句数量(见图14),复另行书“毛诗卷第某”,而于二卷之间空二行(见图11)。此经中遇有二字相叠者,第二字即以“=”代之,虽较正文略小,然仍占一字之空间(图15)。是为嘉祐石经《毛诗》大致之书刻格式。依照前文所述方法,据上海图书馆藏拓片第一叶至第卅一叶第二行,可复原《卫风·木瓜》至《王风·采葛序》六层经文,每层三十二行。其余拓本的内容皆稍散乱,不足以排比整齐,因而难以确知《毛诗》经碑每层行数是否存在其他情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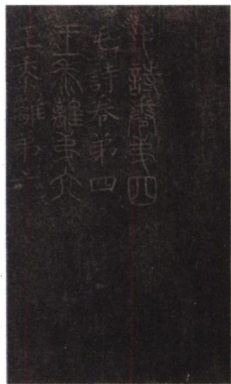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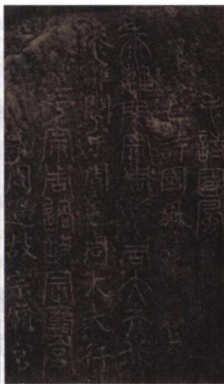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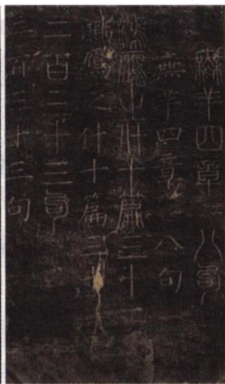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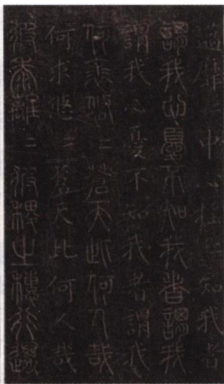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5

据上海图书馆藏《春秋》拓本第十叶,可知《春秋》书一年经文毕,辄另行书下一年。《玉海》云杨南仲书《春秋》十二卷^①,盖十二公各为一卷。

^①王应麟撰,武秀成、赵庶洋校证:《玉海艺文校证(修订本)》卷九,凤凰出版社,2017年,第408页。

《孝经》每章节另行书写。据国家图书馆藏出土残碑之拓片,第一层篆文“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”至第二层篆文“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”^①,以石台《孝经》校之,共计三十三行,则残字所在碑面每层为三十三行。

(二)布局方式

嘉祐石经为表里刻字,此由出土残碑可以证实。

今出土《周易》二石,一碑存《节》至《未济》卦部分,另一碑存《系辞上》部分,两部分经文可以连缀;又黄叔璥云“《易》二碑,《升》《困》《井》《革》《鼎·大象》,《节》《中孚》《小过》《既济》《未济》,《上系》至‘荣辱之主也’”^②。由此可知,《升》至《鼎》卦部分经文当位于今出土二石其中一碑之背面,《周易》之布局方式,并非一碑之正反面连续刊刻,而当是以某种规律排列。黄叔璥又云“《尚书》一碑,《洪范》《武成》《旅獒》《金縢》一行,《康王之诰》《酒诰》石泐不可读”^③,是正反二面之内容亦不连属,其布局方式当与《周易》相似。出土《周礼》残石当为第一碑,正面为《天官·序官》文,背面为《春官·大宗伯》至《大司乐》文,中间经文非三碑六面可以容纳。出土《礼记》残石两面分别为《王制》与《表记》,则书刻顺序断非从一碑正面即刻转向背面。因嘉祐石经每面行数多寡不一,难以遽定全经所占篇幅,故四经之中,除《周易》《尚书》残碑上经文前后相距不远,尚可尝试探究布局方式,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目前则难以推定。

三、经碑复原

今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藏拓本所存残字不在少数,其中或有可与出土经碑相印证者,有可排列成六层而为一整面者,亦有不少仅可得数层乃至数行者。本文拟依据拓本内容,结合出土残碑,尝试复原相连的经碑,以期进一步了解嘉祐石经的书刻顺序和整体面貌。

(一)《周易》

今存出土《周易》有二石,据安金槐文所载残碑照片及上海图书馆所藏拓本排比复原,第二石每层三十四行,首层首行为《涣》卦“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涣”之篆文,末层末行当为《未济》卦“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”之楷书,暂定此为《周易》第N面;第一石每层三十五行,首层首行当为《未济》卦“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”之篆文,末层末行当为《系辞上》“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”之楷书,该面经文接续第N面,故暂定此为第N+1面。

①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: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第38册,第176页。

②黄叔璥:《中州金石考》卷一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12册,第542页下。

③黄叔璥:《中州金石考》卷一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12册,第542页下。

前文已述据上海图书馆藏拓本可复原一面六层经文,每层三十五行,首层首行当为《归妹》卦“也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”之篆文,末层末行为《涣》卦“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”之楷书,此面文字位于出土第二石之前,与之相连,故暂定此为第 N-1 面;又结合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所藏拓本,可复原出五层经文,每层三十五行,第一层首行为《升》卦“以高大初六允升大吉象”之楷书,第五层末行《鼎》卦“君子以正位凝命初六鼎”之楷书^①。以此推测,此五段经文当位于该经碑面第二至第六层,则此面首层首行当为《萃》卦“乃乱乃萃其志乱也六二”之篆文;此外,上文已述及此二面之间尚有一面经文之空间。因此暂定存《升》至《鼎》卦经文者为第 N-3 面,第 N-1 面与 N-3 面之间为第 N-2 面。

嘉祐石经《周易》十卷,与唐石经本分卷相同。参以已知嘉祐石经《周易》之书刻格式,以唐石经本校之,当占约 4800 行,由上文证得嘉祐石经《周易》一层之行数有三十四、三十五行不等,姑以平均每层三十四行计,《周易》十卷需十二碑二十四面方能容下。第 N+1 面以下需约九面之空间,第 N-3 面之上需约十面之空间,加上可以复原的五面,正得二十四面。因此,第 N-3 面当为《周易》第十一面,第 N-1 面当为第十三面,第 N 面当为第十四面,第 N+1 面当为第十五面。

黄叔瓚云“《易》二碑,《升》《困》《井》《革》《鼎·大象》,《节》《中孚》《小过》《既济》《未济》,《上系》至‘荣辱之主也’”^②。黄氏所见嘉祐石经《周易》残石二块而经文则占三面空间,经上文排列复原,即《周易》第十一、十四、十五面(见图 16)。第十一面与第十四、十五面不相联属,而其与此二面之一必互为表里,由此益可知嘉祐石经《周易》绝非于一碑之阴阳面连续书刻的布局形式。排比可知,第十面(未见拓本或残石)当与第十五面分别位于第十碑之阴阳,第十一面当与第十四面分别位于第十一碑之阴阳,第十二面(未见拓本或残石,仅据前后面推测)当与第十三面分别位于第十二碑之阴阳。知必如此者,若以第十一面与第十五面互为表里,中间第十二至十四三面则无法安置。由此做进一步推论,《周易》既为十二碑,则经文由第一碑正面开始刊刻至第十二碑正面,是为第一至第十二面,复由第十二碑反面刊刻至第一碑反面,是为第十三至第二十四面。如此书刻顺序,当系一较为合理的推论。晁会元云“复原《周易》碑墙第十石正面无字,背面为上海图书馆存帖‘《旅》《癸》《兑》《涣》’四卦文字……第十二石正面仅存末列《归妹》数

①第四层《井》“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”至《革》“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”二十行,上海图书馆藏本无,国家图书馆藏本有。

②黄叔瓚:《中州金石考》卷一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912 册,第 542 页下。



图 16 部分《周易》经碑复原示意图^①

行,背面存《系辞》6列”^②,其说不确。

(二)《尚书》

今存出土《尚书》仅一石,据残碑照片排比复原,得经文五层,每层三十五行,第一层首行当为《康诰》“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”之楷书,第五层末行当为《酒诰》“弗罔乃事时同于杀王曰”之楷书,以此推测,此五层经文当位于该经碑面第二至第六层,则此面首层首行当为《康诰》“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”之篆文。

前文已述据上海图书馆藏拓本可复原六层经文,每层三十行,首层首行为

^①笔者据残石及拓本文字复原出五面碑图。图中各面右上为该面首层首行经文,左下为该面末层末行经文。由右至左共三碑六面,其中第十、十一、十二面为各碑的正面,第十五、十四、十三面为各碑的背面,经文书刻的顺序应为第十一面左下后接第十二面右上,第十二面左下后接第十三面右上,第十三面左下后接第十四面右上,第十四面左下后接第十五面右上。

^②晁会元:《北宋太学二体石经新证》,虞万里主编:《七朝石经研究新论》,第404页。

“尚书卷第一”之篆文，末层末行当为《舜典》“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”之楷书^①。

据上海图书馆藏拓本，可复原得经文六层，每层三十三行。首层首行为《洪范》“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”之篆文，至第五层第四行为《洪范》文及《分器序》，第五行至第六层第二十七行为《旅獒》全文及《巢命序》，第二十八行至第三十三行为《金縢》篇首及序文一行。此与《中州金石考》所著录之《尚书》一石内容大致相同^②。暂定此为《尚书》第N面。据黄叔瓚说，此面文字当与20世纪50年代出土之经碑互为表里。

据上海图书馆藏拓本，可复原得经文六层，每层三十五行。首层首行当为《金縢》“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”之篆文，末层末行当为《大诰》“其劝弗救王曰呜呼肆哉”之楷书。此面文字上承第N面，故暂定为第N+1面。又第N+1面与出土残碑之间，校以唐石经本，尚有二百〇四行文字，恰容一面六层，每层三十四行，当始于《大诰》“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”之篆文，至《康诰》“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”之楷书止，可暂定为第N+2面，则出土残碑所存为第N+3面。

据上海图书馆藏拓本，可复原二层经文。由拓本第四十一叶第三行至第四十六叶第二行得一层二十九行经文，首行为《洪范》“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”之楷书，末行为“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”之楷书；由第四十六叶第三行至第五十一叶首行得一层二十九行经文，首行为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二”之篆文，末行为“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”之篆文。以唐石经本校之，第一层首行之前当有“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”之篆文，二层之间脱六行经文。国家图书馆藏拓本另有自“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”之楷书至“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”之楷书五行经文，恰可补据上海图书馆藏本所得第二层经文之阙。结合二家图书馆之藏本，可复原二层七十行经文，每层三十五行，第一

①唐石经本《尚书》首为《尚书序》，之后紧接《尧典第一》，并无“卷第一”之题。唐石经本《尚书序》为七十行，若北宋石经有《序》，则二体为一百四十行。然据拓本复原自“尚书卷第一”至《舜典》“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”恰为六层，每层三十行，共一百八十行，排列整齐，不得有《尚书序》之空间。若《序》自为一面，又难以刻满一面的空间。笔者推测，盖嘉祐石经未刻《尚书序》。

②黄叔瓚所著录中有《武成》，然上海图书馆藏本《洪范》之下即接书《旅獒》，《旅獒》之下即接书《金縢》，其间拓本无拼接痕迹，一面中并无可容下《武成》文之空间。且据唐石经本，《武成》在《洪范》之前。是黄氏说盖误衍“武成”二字。晁会元复原北宋石经《尚书》经碑，谓石经《武成》当在《洪范》之后，今证诸拓本，其说非是（晁会元：《北宋太学二体石经新证》，虞万里主编：《七朝石经研究新论》，第401页）。



图 17 《尚书》第 N-1 页碑图

层首行当为“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”之篆文，第二层末行当为“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”之楷书。本段文字与第 N 面首行相连，可知此二层当位于一面下端。另据国家图书馆藏本可复原二层经文，亦每层三十五行。第一层首行当为《牧誓》“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”之篆文，第二层末行为《武成》“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”之楷书。此两段各二层七十行残字，以唐石经本校之，中间亦脱二层七十行经文，三段拼接整合，恰为一面六层经文，位于第 N 面之前，故暂定为第 N-1 面。又据上海图书馆藏本第卅叶第二行至四十一叶第四行，可复原二层经文，每层三十五行。第一层首行为《泰誓下》“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”之篆文，第二层末行为《牧誓》“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

昏”之楷书^①。此段残字下连第 N-1 面首行“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”，故推之其当为第 N-2 面之第五、第六层，该面每层三十五行。图 17 为第 N-1 页碑，以仿宋字表示石经篆体，以宋体字表示石经楷书，无框黑色部分本于上海图书馆藏本，有框黑色部分本于国家图书馆藏本，红色部分为拓本残缺之处，今依唐石经本补出。

吴玉搢曰：“《尚书》三碑，存《牧誓》《武成》《洪范》《旅獒》《金縢》《康诰》《酒诰》之文。”^②黄叔瓚曰：“《尚书》一碑，《洪范》《武成》《旅獒》《金縢》一行，《康王之诰》《酒诰》石泐不可读。”^③比照上文复原所得，吴氏所见者，当为第 N-2、N-1、N、N+3 四面文字，位于三碑之上，则其中有两面互为表里；黄氏所记稍有误（辨见前文注释），当为第 N、N+3 面，二者为同一碑之阴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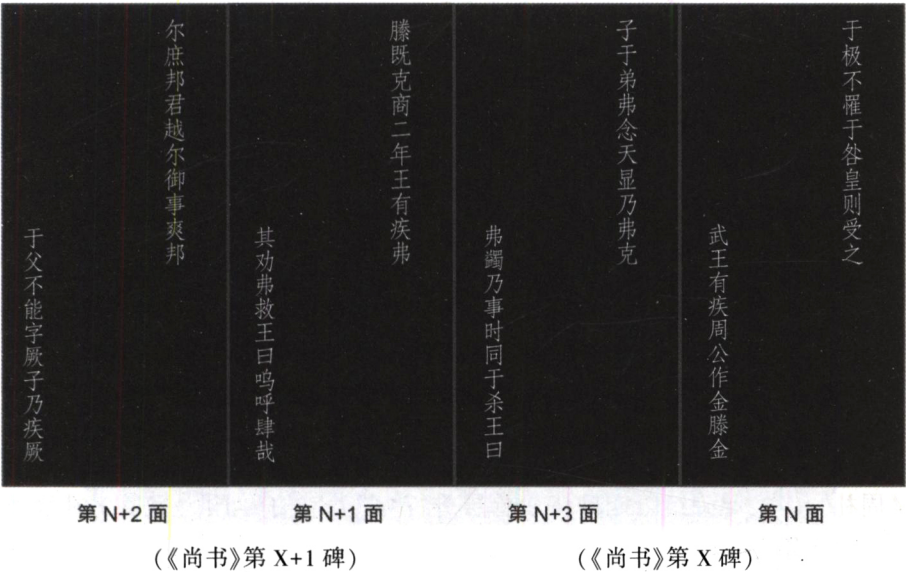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8 部分《尚书》经碑复原示意图^④

①楷书“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”一行，上海图书馆藏本无，国家图书馆藏本有。

②吴玉搢：《金石存》卷五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壹辑·叁拾册，北京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49 页下。

③黄叔瓚：《中州金石考》卷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912 册，第 542 页下。

④笔者据残石及拓本文字复原出五面完整碑图以及一面中第五、六二列经文，涉及经碑表里者仅四面。图中各面右上为该面首列首行经文，左下为该面末列末行经文。由右至左共二碑四面，其中第 N、N+1 面为各碑的正面，第 N+2、N+3 面为各碑的背面，经文书刻的顺序应为第 N 面左下后接第 N+1 面右上，第 N+1 面左下后接第 N+2 面右上，第 N+2 面左下后接第 N+3 面右上。

上图 18 为据残石及拓本文字所复原之四面经文起讫示意图。北宋石经《尚书》十三卷,与唐石经本分卷相同,而无《尚书序》。参以已知北宋石经《尚书》之书刻格式,以唐石经本校之,当占约 5200 行,由于已知石经《尚书》一层之行数有三十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行不等,似差别较大。第 N-2 面以上约占 2000 行,第 N+3 面以下亦约占 2000 行。假设《尚书》经碑之布局与《周易》相同,则第 N+1 与 N+2 在同一碑之二面,而此为《尚书》经碑组之末端,第 N 与 N+3 则位于倒数第二碑之上。然若如此排列,同样 2000 行左右之空间,前后相差两面,似又不甚合理。因此,对于推算《尚书》经碑的数量、布局形式皆存在困难,故暂阙如。

(三)《周礼》

今存开封县陈留公社所出土《周礼》一碑二面,正面为《天官·序官》《冢宰》文;可据罗振玉《吉石庵丛书》三集所影拓本复原;背面为《春官·大宗伯》至《大司乐》文,可据国家图书馆藏整张拓片照片复原。正面复原得六层经文,每层三十行。上文已证得《周礼》石经的形制较为特殊,系以四块经碑为一个碑组连续书刻。据排比所得,第一组经碑正面,每层共一百十七行,因此复原得第一碑正面首层首行为“周礼卷第一”之篆文,末行为“胥四人徒四十人”之楷书;末层首行为《小宰》“曰廉辨以法掌祭祀朝觐”之楷书,末行则当为“府曰各修乃职考乃法待”之楷书;而此碑组第四碑正面末层末行当为《宫正》“析而比之国有故则令宿”之楷书。又出土残碑背面可复原得六层经文,每层亦三十行。排比所得,该组经碑背面,每层共一百十六行,因此复原得第一碑背面首层首行为《大宗伯》“礼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”之篆文,末层末行为《大司乐》“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”之楷书;据国家图书馆藏《周礼》拓本,此碑组第四碑背面首层首行为《大宗伯》“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”之篆文。

观复原所得第一组四块连续经碑之内容(见图 19、图 20),可以推知北宋石经《周礼》的书刻顺序与《周易》不同。今出土之残碑显然为《周礼》第一石,然其背面文字并非全经之末,是其后必另有经石。依唐石经本,第一组碑表里之间,即该组第四碑正面第六层末行至其背面第一层首行之间,当有脱文约 3450 行,若按照第一碑组每层的行数进行排比,则脱文占二十面之空间;然第一碑组表里共八面,如依此排列,二十面之数不足三组经碑,却多于两组,必不可能。缘此,当有两种可能之情形。第一,此 3450 行脱文若仍按照第一碑组之行款排列,则此数碑组之经碑数必与第一组不同。第二,如以下若干碑组之经碑数与第一组相同,则每碑面之行数需减少或增加,即碑石之宽度需有所不同。石经系朝廷组织刊立,其形制当有一定,不当差别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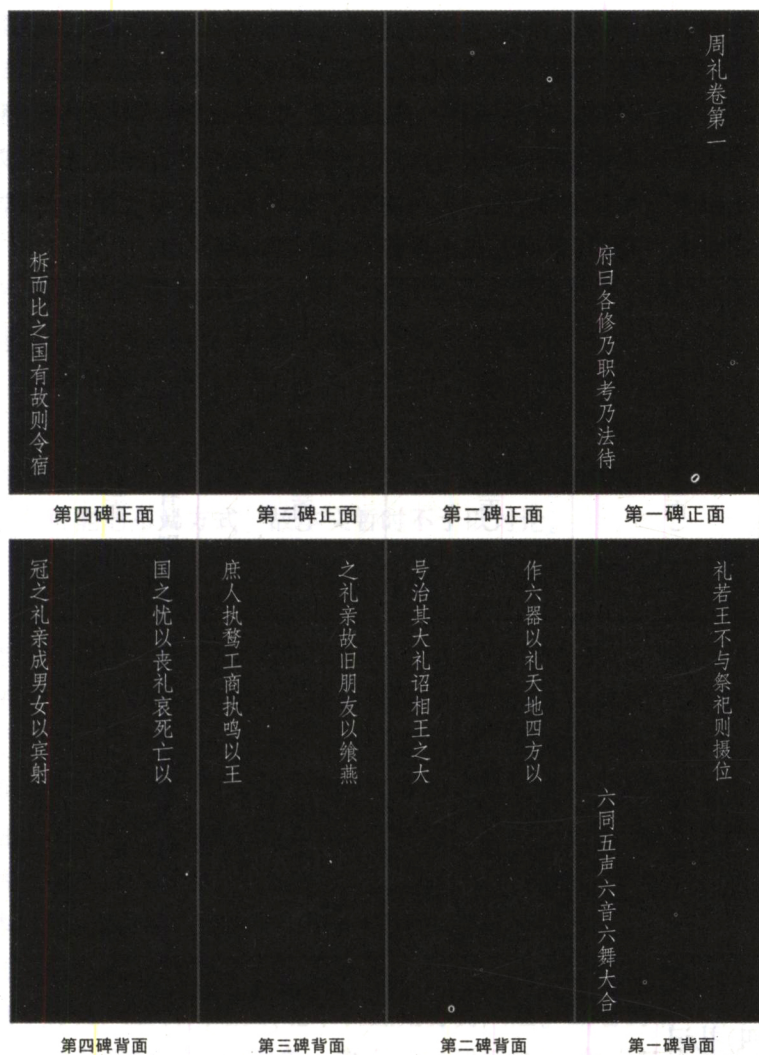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9 《周礼》第一碑组经碑复原示意图^①

大。有鉴于此,当以第一种可能性更大,则第一碑组正面末行至背面首行之间,当有十碑表里共二十面,或由三碑、三碑、四碑组成三个碑组;或分为两个碑组,每组五碑,此种组合方式横跨较大,不便于阅读和拓印,因此可能性

^①笔者据出土残碑拓片以及《吉石庵丛书》第三集所影拓本复原出第一碑组第一碑两面经文。图中第一碑正、背二面右上为该面首层首行经文,左下为该面末层末行之经文。据唐石经本排比,推测出第四碑末层末行之经文。笔者又据国家图书馆藏拓本,排比出第四、三、二碑背面第一、第三两层经文,图中此三面右上为该面首层首行经文,左上为该面首层末行经文。四碑背面经文书刻顺序为第四碑背面左上下接第三碑背面右上,第三碑背面左上下接第二碑背面右上,第二碑背面左上下接第一碑背面右上。

较低。综而言之,即从《周礼》卷首至卷六《春官·大司乐》,共占四组十四碑。《大司乐》以下,以唐石经本校之,约有 5600 行,需约十六碑三十二面之空间,盖分为四个碑组,每组四碑。总而观之,北宋石经《周礼》共三十碑,至少分为两大段或更多,第一段应当由四个碑组共十四块石碑组成,经文从第一组碑正面书写至第四组碑正面,再由第四组碑反面书写至第一组碑反面;又当有四组十六碑,其布局方式不可确知,故阙如。

(第四碑组正面)	(第三碑组正面)	(第二碑组正面)	周礼卷第一 (第一碑组正面) 栢而比之国有故则令宿
(第四碑组反面)	(第三碑组反面)	(第二碑组反面)	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 (第一碑组反面) 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

图 20 北宋石经《周礼》前四碑组示意图

(四)礼记

今存《礼记》残碑一石,表里皆刻字,然损毁严重,一面为《王制》残字,仅存二层,内容为“九年耕,必有三□之□,□三十年之通,虽有凶旱水□□无菜色,然后天子食,□举以乐。天□□□□□,□月而葬,诸侯五日”^①;一面为《表记》残字,存三层,稍可辨识。国家图书馆藏《礼记》拓本中有《王制》残字,经复原,可得六层经文,每层三十四行,首层前八行当为《檀弓下》之末及卷三尾题,末层末行为《王制》“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”。此十字下距安金槐文所载出土残字,当九十六行,盖为三层,每层三十二行。如此,若国图拓本所复原者为经碑一面,则出土《王制》残字二层,当位于一面经文之第

①安金槐:《记开封新收集的北宋石经》,虞万里编著:《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》,第 1159 页。

四、第五层。再结合出土《礼记》碑阴阳二面分别为《王制》和《表記》，则可以推测，嘉祐石经《礼记》经碑的布局方式，绝非一碑互为表里连续书写。

唐石经本《礼记》第一篇为玄宗诏改之《唐月令》，故置于全经之首，北宋石经《月令》当仍为第六篇，位于《王制》之后。据唐石经本，《王制》之前当有 2650 行左右，《表記》之后当有 2750 行左右，嘉祐石经一面至少在 180 行以上。虽然难以确知二体《礼记》经碑之数量，然由以上数据仍可以推测，此经之布局方式，当从第一碑之正面连续书刻至最后一碑之正面，复从最后一碑的背面连续书刻至第一碑的背面，与《周易》相同。

（五）《毛诗》《春秋》《孝经》

《毛诗》《春秋》二经，今仅存拓本，而无残石出土；《孝经》虽有出土者，然只得一面二层残字。是此三经皆无法推算其经碑的数量、诸残字所在之坐标以及可能的布局方式。故本文暂时不予以讨论。

四、结语

本文结合出土残碑和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两家机构所藏北宋二体石经拓片、拓本，确定了部分石经的形制，通过推论，基本可以确定《周易》《礼记》二经的布局方式，即由第一碑正面连续刊刻至最后一碑正面，再从末碑背面刊刻至首碑背面。《尚书》盖亦遵照此形式排列，然据现有文献复原时仍有龃龉不通之处，故笔者不敢遽下结论。《周礼》之布局较为特殊，分为至少两段碑组，已知第一段当与《周易》《礼记》大致相同，余者因无出土实物和拓本印证，难以准确判断，然大略当与第一段相同。

北宋石经大体的碑式与唐石经相似，皆为“分层横列”。唐石经将一碑从上到下分为八层刊刻经文，北宋石经则分为六层。二者另有一不同之处，即唐石经中存在“跨书”的现象。唐石经在刊刻之初，便设计以卷为单位布局，将经文一卷内容平均分成八段刻写于石碑之上，则势必遇有某些卷次篇幅较大不能为经碑一面所容纳而延及旁碑，以致某些碑面实际上被分为左右两栏，亦从上而下八层，右栏首层上接前一碑面之首层，以下七层皆是如此。唐石经的“跨书”现象与当时的书册制度有关，同时，可能系对大历“五经壁本”书写款式的继承^①。

唐石经改变了汉魏石经“一行直下”的碑式，改为“分层横列”，北宋石经继承了这一形式。但在书刻顺序和布局方式上，本文经过考证，认为北宋石经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皆由经碑一面之首层向末层依次向下书写，而后于

^①唐石经“跨书”现象及其与书册制度的关系，参见侯金满：《唐石经碑式与中古书册制度关系探微》，《文献》2021年第4期，第30-52页。

下一碑面以同样的顺序继续刊刻;《周礼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石经“跨书”的形式,但其本质仍更接近《周易》等经碑的书刻顺序和布局方式。马衡叙述汉石经称“其排列之法是各经自为起讫,每一经占若干碑,‘骈罗相接’如堵墙,经文自第一碑刻讫于末一碑,又自末碑之阴直至第一碑之阴止”^①。上文考证所得北宋石经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的书刻、排列之法就整体而言,实本诸熹平刊石。

出土北宋石经《周易》二石,第一石残高1.91米,残宽0.36-0.42米,存字六层,每层最多者为十六行,据复原此碑面每层三十五行,是完整经碑书刻部分约宽0.9米;第二石残高1.67米,残宽0.43米,存字五层(第五层下半不全),每层存字最多者十六行,此碑面每层三十四行,是其刊刻部分约宽亦0.9米。《尚书》一石,残高1.5米,残宽0.86米,存字六层,每层存三十五行,考虑到《尚书》第一面刻《尧典》《舜典》仅每层三十行,则《尚书》经碑宽度较《周易》略小。《周礼》一石,残高1.76米,残宽0.85米,两面皆存字六层,每层皆刻三十行,其宽度盖与《尚书》相近。《礼记》一石,残高0.92米,残宽0.21米,一面存字三层,每层存八行,据复原此碑面三十四行,是其刊刻部分约宽0.9米。《孝经》一石,残高0.55米,残宽0.52米,存文字二层,上层二十一行,下层二十行,推算此碑面每层三十三行,是其刊刻部分约宽0.82米。综上可知,嘉祐石经虽然各经碑石之宽度不一,但并无超过0.9米者^②,而每层的高度,大约俱在0.3米左右。据王天然考证,蜀石经“原石书刻部分横长大体在90厘米左右,纵高则在30厘米以内。而唐代官府文书用纸规格为唐尺的1尺乘1.5尺,即纵30厘米,横45厘米,蜀石经一石恰当此类唐纸两纸之幅”^③。

北宋石经的大体碑式承自唐石经,而其刊刻部分的尺寸,应当受过孟蜀石经的影响。据王天然的研究,蜀石经“形制小巧”,是“唐石经影响下的帖式刻石”,其称“唐蜀石经以帖式入石,这一形制最初之目的即直指传拓,此与汉魏石经为碑式刻石、指向传写根本有别”^④。唐、蜀二朝石经正处于写本、抄本向刊本过度的时代,唐石经作为“古本之终,今本之祖”^⑤,其重要旨

①马衡:《汉石经集存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4年,第1页下。

②由此亦可推知《周礼》各碑宽度应当大略相近,一层之行数不会有上下近十行之差别,进而可证上文关于《周礼》碑数之论述。

③王天然:《蜀石经形制辨识》,《文史》2019年第3辑,第125页。

④王天然:《蜀石经形制辨识》,第128、127页。

⑤严可均:《唐石经校文·序例》,《景刊唐开成石经附贾刻孟子严氏校文》第4册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995页上。

趣之一在于固定经文,同时兼顾流传,蜀石经则更倾向于传拓、装裱的便利。北宋石经之刊立,盖始于庆历元年(1041),毕功于嘉祐六年(1061),而北宋初年“国子监书库官负责图书刻印与发行的工作,所刻书除供朝廷赏赐诸王辅臣、颁赐地方学校外,还可以印卖出售及租赁书板”,“国子监所储《九经》《说文解字》等书板,是可供士民付钱刷印的”^①,且因印刷造成雕版损坏不堪使用,故而朝廷组织校勘重刻,可知当时政府、学校和民间所需的经书,已经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刊本印刷。嘉祐石经处在刊本已经逐步取代写本、抄本的时代,其在形制上仍然仿照唐石经,在书刻顺序和布局方式上承袭汉石经,而同时在最大限度上兼顾摹搨所需。这一现象对于探寻历代石经形制、刊刻旨趣等问题上,应当有一定的意义。

由于出土残石数量有限,拓本剪裱后对石经全貌的认识形成了一定的困难,致使对北宋石经的复原仍有诸多问题无法确知,期待日后能有相关新材料的发现和公布,从而可以检验上述结论,并且进一步推动对嘉祐石经的认识。

【作者简介】徐炜君,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中国经学史、中国古典文献学。

^①张丽娟:《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44-45页。